

# 中国诠释学与文本阐释理论

## ——跨文化视野下的现代构建

□ 顾明栋

扬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扬州 225009

诠释学是一门理解文本和阐释世界的哲学和技艺。在当代思想中,诠释学的主流由三个相互关联的部分组成:(1)诠释理论;(2)诠释哲学;(3)诠释批判。笔者的研究尽管与这些诠释学相关,但关注的重点是“文本诠释学”。文本诠释学可以松散地定义为文本作品的阐释理论,这在中国传统中尤其如此。中国传统不仅因其有无数的文本而自豪,而且以其悠久的诠释传统而自豪。这一传统的中心是对各种各样经典的解释和对诗歌、小说、戏剧进行研究的阐释理论。在本文中,笔者从比较的视角将中国古代思想中的阐释理念与西方现代阐释理论进行有意义的对话,藉此重新审视中华传统早期关于阅读和阐释的基本观点,将散落在不同之处的概念性观点整合成中国文本诠释学的奠基理论,并构建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文本阐释理论模式,找出中国传统诠释学与西方诠释学相似或相异的特点及其对人类诠释学的贡献。

孟子和庄子是探索中国传统诠释学理论的先驱。后世思想家和学者基本上都追随着他们开创性的努力,沿着他们开辟的思路,进行阐释理论的概念性阐述。孟子将阐释视为与作者交朋友的过程,不仅预示了狄尔泰的人文主义诠释学,也触及了伽达默尔关于阅读要不断修正“前见”以达到作者和读者视野融合的观点,并揭示了阐释是一个人类努力付出的过程,它要求感同身受的理解,不断调整先入之见,以及不断克服偏见与偏好。相比之下,庄子基于语言怀疑论的阐释观具有解脱语言表征束缚的启示和功效,它支持后世学者探究阐释的开放性,鼓励人们探索新的表达方法和阐释方法,从人的存在的角度去探索诠释学理论。中国古代诠释学由孟子和庄子开创的两条阐释路径虽然不同,但本质上是相辅相成、殊途同归的。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笔者认为,孟子的阐释理论更接近于狄尔泰的人文主义诠释学,其核心观点是把“理解”归结为一种生活范畴;而庄子的理论更接近于海德格尔把“理解”作为

生活的范畴激进化为存在于世必不可少的前提,即“理解是此在自身存在的潜在性之存在性的存在”。

中国古代思想家们沿着孟子和庄子的阐释路径,到魏晋南北朝,已基本奠定了中国文本诠释学的基础,并完成了一种隐性体系的建立,后世参与诠释理论探讨者虽然人数众多,著述如林,但基本上是对他们的观点的发扬光大。本文虽然主要探讨的是中国文本诠释学奠基时期的思想,对于后世的有关著述由于篇幅问题只是关注与奠基理论紧密相关的观点,但根据笔者的初步探究,古代文本诠释理论仍然是建立在中国哲学传统对人的存在和世界意义的理解之上的,与西方古典诠释学相比虽然没有那么强的系统性、思辨性和抽象性,但其从审美感受和语言哲学角度的探讨自有其独特的哲学形态,具有直观感悟、贴近人生的长处,而无西方传统,特别是德国传统那种繁琐论证、高度抽象、拒普通读者于千里之外的短处,更接近于现代存在主义的诠释学。孟子的“以意逆志”说是建立在“知人论世”的哲学基础上的,而庄子的“物无非彼,物无非是”既涉及语言哲学,更是建立在“齐物论”的存在主义基础之上的。与文本阅读紧密相关,与西方诠释传统相比,中国诠释传统似乎有以下鲜明的特点:

第一,中国的诠释传统注重文本阐释,并通过文本阅读理解产生两大诠释路径。正如西方的诠释学起源于解释基督教经典的宗教需要,中国的诠释学也兴起于解释国家首肯的经典的教义需要。如果说西方诠释学是宗教神学和哲学理论这两个既相关又很不相同的两大传统,中国的诠释学存在着占据主流地位的儒家传统和处于相辅相成地位的道禅传统。由于大部分经典都是显而易见的儒家经典,中国的诠释传统是儒家的主流,极其重视政治灌输和道德教化。但是也存在着另一个十分有趣的传统。如果我们把统治地位的传统称为“政治伦理传统”,另一个传统可以成为玄学美学传统,这是因为后者发端于对文本情况的玄学关注和艺术关注。在不公

开挑战主流传统的情况下,那另一个传统与其展开了动态的互动,这不仅丰富了总体的中国诠释学,而且改变了中国阐释实践的方向。在主流传统和次要传统的互动中,存在着一个清晰可见但很少研究的思潮,其特征是从孟子的意图理论所要求的封闭解释走向由审美暗示理论引导的开放性诠释。虽然孟子的理论决定了中国诠释学的主要方向,审美暗示的理论发展成一个引人入胜的诠释学体系,其核心原则预示了当代的阅读理论和解释理论,特别是文学开放性的思想和开放诗学。

第二,中国诠释传统经历了与西方传统相似的从封闭阐释走向开放阐释的发展之路,但是,中国传统到达那一目的地走过的是一条不同的路径。如果说西方诠释学以思辨的理论性见长,而中国诠释学则以文本阅读的审美性见长。中国传统的开放性诠释兴起于阅读理解的批评实践,不像西方诠释学从一开始就讲究概念性探索,这使得中国的诠释学更讲究可操作性和实用性。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有关开放性的思想产生于经典教义与批评实践之间的冲突。孔子开创了《诗经》的阐释学传统,他提出了一个坚如磐石的理论准则:“《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因为孔子被喻为圣人,儒家学者自然将他的话语奉为圭臬而照字面意义理解。但是令人懊恼的是,他们发现诗集中有大量诗歌偏离这条主题准则。为了处理这种令人不安的发现,他们不得不诉诸众多的诠释方法,最终导致了多样性的解读。结果,尽管他们将文本视为一个封闭的整体,但他们在实际上却开放了文本。

第三,中国诠释传统很早就注意到语言与阐释密不可分的关系,无论是孔孟的传统,还是老庄和佛禅的传统,都认识到,无论是对世界和存在的阐释,还是对文本的阅读解释,问题的核心归根结底是语言问题,而且,不仅承认语言作为交流工具的不可或缺性,又认识到其局限性,因而提倡阐释的直观性、暗示性和审美性。这样的认识要早于西方至少两千年,西方传统直到近现代才意识到语言对诠释的重要意义。中国传统对“言”与“意”、“名”与“实”关系的语言哲学探索实在是了不起的成就。

第四,中国的诠释传统具有饶有趣味的悖论性和辩证性。一方面一些思想家和学者提倡“诗无达诂”,认为评论一首好诗的标准之一是看它是否包含“不尽之意”;另一方面,整个诠释学传统都受到对作者最初意图的无尽追寻的支配,探索作者究竟是圣人、诗人,还是散文家。这在对儒家经典的注释中尤为突出。在历代帝王的支持赞助下,中国传统学者对儒家经典进行阐释,写出了许多所谓的“正义”。《五经正义》可能是其中最雄心勃勃的、力求确立正确诠释的宏大项目。它确实代表了中国传统

寻找文本最初意图的阐释学动力。“不尽之意”的开放性与“意图主义”的封闭性是如此微妙地贯穿于中国诠释传统,其相辅相成、和而不同地在诠释的层面上反映了中国哲学一元论的形而上学思想,是中国诠释学提倡无穷开放性的理论根基。

第五,与西方传统相比,中国诠释传统从一开始就认识到诠释的无穷开放性,而这一点在西方只是现当代才达到的认识。在中国传统中,诠释的开放性思想可以追溯至上古时期。开放性在中国传统中主要来自两大源头:对宇宙形而上学的探究和对经典文本的阐释实践。在文学开放性的哲学探究方面,中国传统远远走在西方之前。早在公元前4世纪,《易经》的注释中就出现了这样一句有名的格言:“[在阐释‘道’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它从此成为赋予相同文本、现象的不同诠释以合理性的家喻户晓的用语。

中国诠释传统与西方诠释学不同的鲜明特点来自何种原因?笔者以为,来自于中国文化在先秦时代就逐渐形成的“以人为本”“经世致用”的实用思想。以董仲舒的“《诗》无达诂”为例,董仲舒的格言出现在汉帝国大一统的语境下如何处理《诗经》等经典流传千年引起的不同解释,如何通过避免单一的诠释准则的尝试以提供一种理论基础,为根据不同的情况对《诗经》作不同的解读的实践作出自圆其说的阐释。董仲舒的开放性阐释思想不仅涉及《诗经》诠释,还涉及其他经典文本。在《春秋繁露》中,有人问他为何《春秋》没有遵守用恰当的头衔来称呼统治者的既定做法,董仲舒作如是回答:“所闻《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董仲舒的这段话表明,哲学和批评的开放性已融合进文本的开放性概念,与当代的开放性观念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从阐释的技术层面考虑,这一段话涉及了诠释学的多个方面,值得我们注意的不仅仅是董仲舒根据不断变化的诠释情况,鼓吹重新语境化的需求;他的论证还涉及了不同经典以及阐释学的不同层面。“《诗》无达诂”涉及了文学的开放性;“《易》无达占”涉及了对世界和存在的阐释;“《春秋》无达辞”承认了语言在表征时的不确定性。董仲舒的论述可以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诠释理论、诠释哲学和诠释批判的极简而要而全面的关注。有学者认为,董仲舒的话中最后一句不是“一以奉人”,而是“一以奉天”。无论是“人”或“天”,此处涉及的都是超出文本阐释,触及对世界和存在的哲学诠释。对这一段话的综合分析表明了中国阐释学的一个核心思想,即文本诠释应根据时代变化,兼顾文本语义,最终的目的是“文以载道”,为人生和社会服务。

■ 《南京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约26000字